

谢尔戈·米高扬是俄罗斯科学院和平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米高扬博士在 1990-1991 计划年期间担任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于威尔逊中心驻留期间撰写了本文。本文的扩充版将作为一章发表在即将出版的新书《斯大林现象》中（伦敦：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Limited, 1992）。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1992 年 8 月版权所有  
佩吉·麦金尼编辑

###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凯南高级俄罗斯研究所**

凯南高级俄罗斯研究所是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部门。该研究所通过其奖学金、会议和出版物计划，鼓励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广泛领域开展有关俄罗斯和苏联的学术研究。凯南研究所由基金会、公司、个人和美国政府之捐款支持。

### **凯南研究所专题论文**

凯南研究所向所有对俄罗斯和苏联研究感兴趣的人提供专题论文。专题论文由凯南研究所的学者和客座演讲者提交，尤其是那些希望及时获得对其工作反馈的人。

### **编注：**

本文原定 1991 年夏天发表，但因 8 月份发生的事件而推迟。作者现在认为本文是一篇历史性文字，反映了他 1991 年 2 月的想法。

# 《我所见的斯大林主义》

著：谢尔戈·米高扬

译：散栎儿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岳父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他是1920年代一位年轻的小镇共产主义狂热者，列宁格勒900天保卫战的英雄——他的一生，以及因为斯大林的直接命令过早惨死在秘密警察之手的事实，反映了自1917年10月以来苏联共产党人的光明与黑暗、浪漫与悔恨、希望与绝望。

## 序言

本文试图描述我个人的斯大林主义经历，并对整个斯大林主义现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同时探讨专研该领域历史学家的某些论述中存在的问题。读者可能会认为，研究斯大林主义对我来说要比西方历史学家容易得多。实际上，有几种情况使我对这一时期的分析变得异常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我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将我的注意力从苏联吸引到了其他国家，尤其大西洋彼岸的国家。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最恶劣的特征对我而言不是什么学术研究对象，而是生命中至少前二十四年的自然环境。因此我在成长过程中难免出现某些机能障碍，这些障碍或多或少阻碍了我形成正常人格。我希望我的读者记得，我不仅生活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心地带，更生活在斯大林最亲密助手的家庭中——不幸的是我就住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内而非围墙外，这堵墙似乎将“古往今来各民族的伟大天才”与大约两亿人安全地隔离开来。我经常近距离观看一位身穿元帅制服的矮个子男人，身后跟着或簇拥着一群人，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我做梦都不敢想见他一面。虽然几乎每天深夜，或者说每天清晨，我父亲都会从他住处直接回家。

这些情况——以及许多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此逐一详述的其他情况——是否允许我保持冷静、客观和具有学术精神的学者身份，去研究一门多年来一直是我生存之本的课题？自1929年出生至今，我的存在与不存在始终不分昼夜地拼命斗争，直到1953年3月5日独裁者去世。

本文读者不必担心会对“斯大林与我”这一主题进行无休止回忆，但我希望请你们做好准备，因为我的行文方式——思想和论点——可能显得有偏见，或者至少不是绝对客观。当然，人们总可以争辩说一个人永远无法做到绝对客观，但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没有谁能够不带感情地审视斯大林主义这种独特现象。我感谢上帝，电脑没有像被编程下国际象棋那样被编程来玩“斯大林主义”。因此我想明确指出，我并不声称自己是公正无偏私的。何况，我也不希望自己是公正无偏私的。我生活中有太多事情与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习气相关联，因此我无法以冷静、平衡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个巨大且充满感情的话题。

## 我所见的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是什么？虽然我更愿意用过去式——斯大林主义曾经是什么？——来提出这个问题，但也许现在式更正确，否则，如果有必要进行猜测，那也是徒劳无益的。“斯大林习气”（Сталинщина）这个新词的出现是因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开始被理解为一种更宽泛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斯大林生前统治下的制度。“斯大林主义”涵盖了此制度所隐含的一切：野蛮、残酷和毫无意义的大规模恐怖，镇压造成的恐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国安部的全能机器，数百万受骗者和天真者的盲目性，意识形态的僵化异变为激烈、普遍和压倒性的狂热——甚至征服了斯大林同时代那些以正派、人道和智慧著称之人的诚实和常识。为什么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词？不仅因为它在俄语中带有明确的否定性，带有强烈的蔑视和厌恶腔调，而且因为许多人开始表达这样的观点，即它不是随着斯大林在1929年或1920年代末的某处实行独裁而诞生的，而是在更早时候，也许是在1917年10月，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的名义下诞生的。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明白，斯大林主义并未在1953年3月随斯大林一同消亡。很遗憾，即使今天我们也无法庆祝它被彻底埋葬。

无论未来趋势如何，我仍然绝对相信不管来自公众或统治精英的压力多么大，对斯大林时代的积极评价在未来苏联都不会占上风。事实上，即使是以蔑视民主和人文主义潮流著称的“记忆”民族爱国阵线，以及俄罗斯沙文主义者：《我们当代人》（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和《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周围的团体，也在努力克服他们昔日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忠诚。福缅科1990年在《我们当代人》（1990年第8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是这些团体的典型代表，听起来像是他们最近意识形态发展的宣言（作者的乌克兰姓氏没有任何意义，俄罗斯有许多这样姓氏的俄罗斯族人）。福缅科在这篇文章中不仅贬低斯大林，而且贬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俄罗斯帝国的思想（当然不提“帝国”一词——这是他们认为唯一合理的伪装）将这些团体引向帝制的俄国、临时政府的俄国，偶尔（尽管小心翼翼地）引向制宪会议的俄国（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解散了制宪会议，喀琅施塔得水兵热列兹尼亚科夫说了句臭名昭著的话：“卫兵都累了。我请求你散会回家”）。

就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而言，我知道在原先党的机构和“党的知识分子”中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中有几位，无论他们是否暂时设法夺取了国家的政治“指挥高地”，他们今后都永远不可能公开采取亲斯大林姿态。让我们回顾一下，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十年里，即使如教条主义的、愚蠢的、万能的思想家苏斯洛夫这种斯大林主义者，也阻止提到斯大林。今天任何政治人物呼吁对斯大林有更积极的看法都是自寻死路，往后亦将如此。苏联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但纵然出现教条主义和保守官僚们取得全面胜利（无论如何都注定是短暂的）这种最悲惨情景，也不会把斯大林撵出他理所应得的泥塘，重新送回神坛。

所以我们必须再问一次，斯大林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更准确表述应该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什么属于斯大林主义？什么是斯大林主义的遗产？用这种问法似乎更容易得出概括性结论。

当然，斯大林主义的核心是“斯大林习气”，即“大清洗”、“大恐惧”。让我们试着理解一下那些在“开放政策”施行后重启后1956年时代讨论的人的逻辑，这些讨论在1964年后被苏斯洛夫及其意识形态集团延缓并中止了——我指的是公开讨论，私人讨论和分析从未停止过。虽然官方保持沉默，并小心翼翼地对斯大林进行了片面的平反，但越来越多人逐渐受到生活本身的刺激开始思考斯大林主义（他开始出现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前工业和技术成就的电影、书籍中）。

我建议读者设身处地设想自己是个普通苏联男人或女人，甚至是个有兴趣听大人说话的青少年，让他们阅读关于政治的书籍并独立思考（年轻人甚至在青春期之前就能独立思考，我小儿子就是证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经历过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时期或某些方面。还因为他们是真正决定斯大林主义命运的人，尽管尚未到最后时刻。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有无能力克服前几十年的洗脑、赫鲁晓夫时代石破天惊的揭露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死一般的沉默。

这一切都不容易。即使在国外分析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也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更不用说历史分析的不同趋势了。苏联内部和外部对斯大林主义进行的历史分析的区别在于各自讨论的实质和意义。对苏联公民而言，这些讨论必然意味着一场关于了解他们现在和未来日常生活中最重要问题的激烈斗争。读者必须明白，对我们来说过去并未消失在历史书页中。

从1956年的觉醒开始，人们对斯大林主义有了两种极端解释：**a)** 斯大林是诸般坏事的罪魁祸首，就像早先人们把他与一切伟大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所有这些实体都不应受责备，反而应当同情斯大林对它们造成的伤害。或者：**b)** 斯大林主义是由历史、政治和社会环境注定的，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直接成果，斯大林的个性起了一些作用，但微不足道。第

二种解释实际上既适用于辩囿斯大林的人，也适用于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至少是反对列宁主义）的人。

直到最近在苏联还很难完全坦率地批评列宁（这不仅适用于已出版的作品，也适用于个人做好剖析过去的心理准备）。如今这个话题和许多其他话题一样在苏联不再是禁言。然而解放思想所需的时间比下定决心公开自己思想所需的时间要短，当然，还要克服编辑和官方审查的障碍。

我还记得 1956 年期间及之后朋友们和同事们的讨论。对列宁的谨慎批评在心理上仅限于回顾，例如 1921 年“关于党内团结的决议”。列宁担心党在血腥内战中取得胜利后分裂，并面临着统治一个农民为主的、被充满敌意的“资本主义包围”的国家的任务，因此提出了一项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我通常根据时代标准来处理这种微妙话题：鉴于列宁所面临的困难局面，他的行动主观上可以理解，但客观上，该决议给了斯大林一条捷径去摧毁任何或多或少组织起来抗衡他的反对派。

受过教育的人和知识分子不满意第一种解释。赫鲁晓夫当时就持这种观点。尽管赫鲁晓夫在他的“口述录音带”中为纠正历史和他本人的形象做了很多工作，但他在回忆录中还是重申这一观点，而不去考虑他的回忆是否可信。这种解释简直荒唐可笑。

在此似乎有必要指出一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却值得了解的趋势，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思考和分析过去的过程。这里我指的不仅是那些在国外被广泛阅读、重读和引用的作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还包括科学界知识分子，他们往往领先于那些以研究我们社会历史为职业的人。当尤里·阿法纳西耶夫<sup>1</sup>还在谴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时候，当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sup>2</sup>还在为苏共中央和政府撰写“黑白颠倒”政治文件的时候（两人私下交谈时都坦率得多，如果不能称为玩世不恭的话），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早已不带偏见地讨论过一些基本问题。

我不是在指任何人虚伪，当然我也无权这样做。问题要比虚伪或故作惊人之论复杂得多。苏联从事政治学思想者的思想本身就是畸形的：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解放思想，摆脱“内心审查”，坦率写出自己真实想法。从事严谨科学之人的心理过程则完全不同。安德烈·萨哈罗夫无疑是这些思想家中的佼佼者，但我也遇到过许多直言不讳、逻辑严密、毫不妥协地提出所谓“难题”的人。他们的优势不一定是道德优越感（萨哈罗夫本人确实如此），而是摆脱了教条和刻板印象，对任何特定意识形态都没有职业承诺，能够采用新颖、公正的方法寻求明确答案。而从事社会科学和政治实践的人习惯于将常识和显而易见的事实调整为**社会主义的原因**。

不幸的是，我父亲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虽然绝不缺乏常识、真诚或正直，但他却狂热到为了党的目标（党的“集体领导”或领袖个人制定和定义的目标）而压制这些与生俱来的品质。关于他作为党的工作人员以及后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所扮演的角色，我还会有更多论述。但作为一个人，他只是在一个狭窄的空间内，或者说是在笼子内活动，这个笼子是用**党的利益、遵守党纪、社会主义利益、苏维埃政权利益**等神圣物品编织的。我见过许许多多诚实正派之人被这些或类似这些坚不可摧的枷锁蒙蔽。

在不同的人身上，狂热和职业易感性、自我否定和虚伪、因循守旧和不惜代价追逐权力、恐惧和顽固（甚至到了愚蠢的程度）的比例大相径庭。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有千千万万种组合。我们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才能理解斯大林政权中除了鹰犬刽子手之外的其他人的行为。无论动机如何，它们都构成了斯大林生前和死后斯大林主义的基础。我将斯大林的圈子(окружение)——几十、几百或几千人都无所谓——的行为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周围知识分子圈子的行为相比较并非偶然。后者为不杀人的独裁者效力，前者管着一群高效杀手。后者开脱的理由显而易见：他们并不是为杀人犯服务。但想想那些经常感到后脑勺上枪管冰冷的人，同样也有“开脱理由”呀。对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身边近臣来说，耻辱只不过是声望稍低的岗位、退休，甚至“外交流放”——美国总统竞选中经常出现的那种职业降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出卖灵魂是可以原谅的——如果能够被原谅的话？

让我们回到普通人尝试评价斯大林主义的想法上吧。赫鲁晓夫天真地想把全部责任推给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具有如此独特的恶魔品质的人——好让共产党的理论和“新”实践看起来既正确又无辜——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它还损害了去斯大林化进程本身。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或许赫鲁晓夫想逃避自己的责任？如果需要负责的不仅斯大林自己，那么还有谁？这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导致改革时期的党内官方文件使用“斯大林及其随从”的说法（也许“随从”翻译为圈子更正确）。1986-1988 年，甚至像阿纳托

1译注：尤里·阿法纳西耶夫曾任苏联《共产主义者》杂志社编辑

2译注：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曾任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利·布坚科<sup>3</sup>、罗伊·梅德韦杰夫<sup>4</sup>这种独立思考的人也提供了协助过斯大林之人的姓名和特点，他们的协助即便不是起了决定性作用，至少也起过重要作用。实际上，他们提供的姓名都是那些在斯大林时期侥幸存活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几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高官。

他们这种做法有一定逻辑性但不多，因为记录了许多人政治行为的大量材料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这些人后来在“古拉格”被杀或一直关到死。无论如何，这个圈子过于狭小，不足以充分解释其有罪的概念（罗伊·梅德韦杰夫关于斯大林的著作当年未能在苏联出版，因此人们是根据他后期的文章和论述去判断他1986-1988年间的观点的）。苏联是个拥有近两亿人口的国家，一个邪恶天才带领十几、二十几个帮凶就能将空前的暴行和绝对的屈从强加于人民？这种说法既不充分也不令人信服。

要解决这个难题，从技术上讲最容易的办法是让名单变得更长。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俄共“一大”至“十三大”<sup>5</sup>的与会者名单合并起来。然而从道义上讲，这种办法会带来一个问题：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死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刑讯室或劳改营的冻土。另外，把名单拉长只会多出两三千个姓名。人们开始问：“党怎么办？”1987-1989年间，本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基辅和敖德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顿涅茨克、高尔基和基尔扎奇、奥勃宁斯克和纳尔瓦、伊万诺沃和新西伯利亚、塔林和杜尚别讲课时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事实上在1920年代的共产党内，民主是唯一存在甚至兴旺发达的机制，讨论热烈、公开、叛逆又直截了当——偶尔会出现近乎侮辱的强烈表达。但有一个人始终受到大家尊重，那就是列宁。可即便列宁也不得不解释、说服、讲道理，很多时候还要参与争论。这样一个政党怎么会允许他们的领导层“背叛”革命呢？斯大林主义是对革命的背叛吗？或是革命合乎逻辑的、可能过于残酷的发展或延续？换句话说，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是相同的概念吗？

同样，我们不要忘记在一段时间内党是极权国家中的一块自由飞地。诚然，对不同群体的不公正迫害不仅被许可，而且被认为是“必要的”。假审判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党派”，导致主要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其他人入狱及死亡，布尔什维克对此熟视无睹。当然，他们可能相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办冤假错案，但为什么他们对于镇压前白军军官、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员和其他无辜者同样不加制止呢？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内战的逻辑。在主要交战方：红军、白军、粉红军甚至绿军<sup>6</sup>心目中，战争其实并未停止。他们还保留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严酷感觉、用手中毛瑟枪解决问题的习惯、与敌人进行决斗的持续意识，以及斗争手段实际上无限制的想法。

亚历山大·齐普科回答《星火》杂志（1990年11月刊）记者提问时称这种做法和行为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准备发动内战也是不道德的。但他忘了补充一句，大多数内战都有类似特点。法国、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和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内战（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为我们提供了无数例子，表明野蛮似乎总是内战的必备特征。而且内战通常不会在休战或缔结和平条约后结束，不会因一方失败或投降而告终。在同一篇文章中齐普科错误地认为1917-1918年间只有布尔什维克准备在俄国发动内战。然而尤里·达维多夫在同一期《星火》上发表的文章提醒我们：“白军”根本不比“红军”好多少。

内战结束九年后，集体化的噩梦却由地方上的党员积极分子实现了。所以执政党领导层和一些普通党员无疑要对内战精神仍在党内占主导地位这一事实负责。不幸的是，仅少数布尔什维克能够意识到集体化是一个转折点，过了这个转折点，党内民主将开始迅速和不可逆转地消失。这就是所谓“关键时刻”。集体化之后，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没什么希望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民主。党注定要失去其内部民主，转而实行僵化无情的一人独裁。当时没人相信恶性循环已经锁定，斧头会砍在党自己身上。也没人预料“大清洗”会降临到那些梦想着全人类幸福的人身上。

显而易见，布尔什维克未能看到镇压全部异议的代价。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布尔什维克家庭里，遇到过许多这种人——在他们被关进古拉格之前和之后。我不同意那些声称党内民主注定要消失的事后诸葛亮。依我之见，并且我在这里信服克利亚姆金的论点：没有民主的社会，就没有民主的群众性政党。存在两种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哪种占了上风不言而喻。

3 译注：阿纳托利·布坚科，1990年第一届乌克兰人民代表。

4 译注：罗伊·梅德韦杰夫，俄罗斯历史和政治作家，持不同政见者。

5 1924年5月在党的十三大上，政治局的意志实际被强加给代表们。向各地区代表团分别宣读了列宁的《遗嘱》，未建议进行讨论。

按照A·米高扬的说法，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此决定上空前团结，令代表们印象深刻，故未提出反对。遗嘱文本既未散发也未交给任何人，当然更没有出版过。所以不能将斯大林几年后利用遗嘱部分内容达成其个人政治目的，解释为斯大林自己对党和人民隐瞒了这份有可能改变历史和国家的文件。

6 绿军这个词在今天的含义完全不同。当年指的是主要在乌克兰境内活动的无政府主义农民武装。

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希望随着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和实施基本社会经济改革，民主会从党内扩展到全社会（我坚信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构成了“老近卫军”的多数，因此斯大林要么被迫消灭他们，要么在死亡——包括家人的死亡——和打成“人民公敌”遗臭万年的威胁下将他们变成顺从的同伙）。当然，老布尔什维克不会允许“革命成果的丧失”，但他们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解释将与斯大林的解释有显著不同。然而，被斯大林娴熟煽动和操控的激烈党内斗争氛围，把迫切需求民主的理解推到一边并延迟了六十年。

回想一下费奥多尔·拉斯科尔尼科夫 1938 年写给斯大林的那封文采焕然且具有毁灭性的公开信吧。这封信展示了今天许多人所说的“本质上是乌托邦”的理想。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是一份宣言，代表了千千万万布尔什维克没说出口的心声。因此它比当代作家的判断更能使我们可靠地体会“老近卫军”布尔什维克的内心世界，而当代作家的感情无论多么可以理解，实则已经发展到痴迷的程度，损害了他们的作品。

回到我们国家对斯大林主义的认知过程，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上发表的著名文章给了成千上万寻求知识、深入了解斯大林主义核心的人们一个答案。克利亚姆金、努伊金、谢柳宁、布坚科、安巴尔祖莫夫、拉齐斯、安德烈耶夫等许多人也做了同样的工作。提问的不是他们——当整个国家要求寻找和揭示真相时，他们只是开始回答这个问题。然而通往真相的道路本质上极其复杂，很难迅速探明。几篇文章甚至更多文章都不足以求得真相。

如果斯大林主义的足迹可以上溯至 1917 年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运动），那么十月革命就可以进一步上溯至更久远的俄罗斯历史——这是一种在苏联内外都很流行的观点。然而据我观察，历史追溯得越远答案就越复杂、越不具说服力。例如，我难以认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亚诺夫和维克托·谢柳宁（或小说家瓦西里·格罗斯曼）的观点，即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都是人民的奴役者，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邪恶天才，他们证明俄罗斯的任何一次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对自由的压制。我无法理解如何将伊凡雷帝与任何通常理解的历史现代化观念联系起来，他血腥专制的成果未必是现代化。无论怎样，真正统一俄罗斯国家的实际是雷帝祖父伊凡三世。相反，执行雷帝旨意的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和他的禁军（Опричник）可以被视为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针对最受教育、最有前途的家庭的大屠杀的始作俑者。费奥凡·格列克<sup>7</sup>的悲惨命运清楚表明了伊凡雷帝看待教育和知识的态度。

为什么彼得大帝要被视为奴役者？这就导致了一种同斯大林的类比，在我看来这种类比太过牵强。彼得登基前俄罗斯的农奴制度已经酝酿了几十年，并由他父亲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绰号“最宁静者”）完成。在彼得统治时期，农奴被从乡村迁移到工厂，附属于制造业和冶金工坊，以获得更有用和更“现代”的工作，而斯大林则将自由农民变回农奴。此外，彼得开启的“通向欧洲之窗”（不同于斯大林的“铁幕”！）使新鲜空气吹遍全国，并让相当一部分农奴自由。彼得热心支持那些愿意剃光旧式胡须并学习科学的普通人，谁能否认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思想自由？彼得提拔所有愿意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人，包括贵族，无论年老或年轻。而斯大林则消灭那些对其个人独裁权力构成威胁的人，更青睐“底层小民”。

彼得和斯大林儿子的命运更无法相提并论（但伊凡雷帝儿子被老爸打死的命运与此类似）。彼得的长子试图扮演政治角色，反对父亲的毕生事业。而斯大林的长子不牵涉政治，他非常不幸，因为他的父亲（那位“伟大领袖”）公开蔑视他，以至于他在战前试图自杀。当他从医院回来，斯大林当着我父亲的面评论道：“连这事儿你都做不好！”斯大林拒绝用儿子交换冯·保卢斯元帅，试图用一句浮夸的话来掩盖自己的不人道行为：“我不拿元帅换上尉。”

伊凡和斯大林之间的类比令人惊讶，但在这个“现代化/不自由”的体制中，亚历山大一世应该放到什么位置呢？没有他，俄罗斯社会的现代化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实现。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和业余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普希金声称，十二月党人运动以及热爱自由的文学、诗歌和史学诞生于亚历山大一世年间。一百五十年后，他的仰慕者、学者内森·埃德尔曼<sup>8</sup>通过详尽的历史分析证明了普希金的观点。至于亚历山大二世，这位被左翼极端分子杀害的伟大改革者，应该被放到哪里？还有另一位伟大的改革者：斯托雷平（被右翼极端分子杀害），他进行了睿智而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又该放到哪里？我认为 1905-1907 年革命后的镇压微不足道，虽然命令是尼古拉二世下达的，但这些镇压被首次出现的俄罗斯议会所抵消。自

7 译注：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的“费奥凡·格列克”是生于拜占庭帝国的画家，安德烈·鲁布廖夫的老师，约 1410 年逝世，并未活到伊凡四世年间。此处或另指他人？

8 内森·埃德尔曼是我的好朋友，我俩在莫斯科最好的高中之一毕业后打了几十年交情。在他 1990 年早逝之前，我们度过了无数个俄罗斯式夜晚促膝长谈。他对当代历史有一种罕见的概括能力，结论基于对过去和现在的“冷酷”、客观研究。

从11-13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市政会议以来，俄罗斯首次出现了议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杜马在现实政治中并不特别有效，但它足够民主，甚至接纳了四名布尔什维克分子。

如果人们采取选择性的而非全面的方法，那么解释历史就很容易。在我们国家，某些年份经常成为这种偏见的牺牲品，也就是说历史被用来证明当前所“必需”的特定结论。波克罗夫斯基<sup>9</sup>应该对此感到满意：不仅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按照他的建议看待历史，许多当代作家（包括一些不免忽视历史研究基本规则的历史学家）也未能抵抗撰写“党化”历史的诱惑。

过去几个世纪对于分析斯大林主义只有一定程度的帮助，我们不要高估它能提供的类比作用。真正的问题是：哪些特征应被视为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哪些应被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一部分？这种区分——如果它存在的话——对于理解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本质至关重要。在理解这一区分之后，或许我们会更容易解释斯大林习气。让咱们一致同意把“布尔什维主义”这个词作为1903年在欧洲社会民主运动中出现的政治运动的术语吧。布尔什维克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后来被称为“孟什维克”的人之间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组织和党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分歧逐年加深，但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主义尚未被权力腐蚀，其狂热更多地表现为自我牺牲，而不是为事业牺牲别人……

\* \* \* \* \*

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确实立即建立了权力垄断。列宁和所有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以及绝大多数第二梯队党员——或者整个党——都认为没必要当真与他们的盟友分享权力。但这是否意味着一党制是那时唯一可选项呢？我并不这么认为，尽管我知道我的看法可能很孤立。

列宁不仅无视民众支持率极低的孟什维克，还想忽略比布尔什维克支持率更高、被视为整场革命斗争中同志的社会革命党人的第一次尝试，引起了几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强烈抗议，他们随后辞去中央委员职务（当年的中央委员会人数甚少，并且扮演了日后政治局的角色）。另一些人也纷纷从第一个纯布尔什维克政府中辞职。最终列宁被迫让步，政府引入了三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为潜在的“多党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随着时间推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显然存在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两种主要态度。不幸的是，列宁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当时并不理解“多党制”重要性，而社会民主党人过于激进，只能名义上充当列宁许可的“共同执政者”。社会革命党开始以布尔什维克的非民主方式进行斗争，就像他们以前斗争君主制一样。然而即使在与布尔什维克发生争执后，社会革命党“多数派”仍于1920年10月正式合法化，尽管时间不长。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俄罗斯缺乏民主传统的问题，1917年二月革命后民主仅存在了几个月。俄罗斯政治文化中几乎没有反对派容身之地，没有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制衡，没有以文明的议会方式解决观点冲突的经验。孟什维克深知采用这些传统对于确保真正的民主发展至关重要，但内战结束后他们的活动立即被禁止，他们的领导人要么被分散到俄罗斯各地，要么被建议移民。

正如我前面描述的，内战中不妥协的两极化产生了不宽容他人观点和对通过讨论解决政治分歧的厌恶情绪。布尔什维克和工农革命党人都是如此。然而孟什维克的特征是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对这种政治共存体系更有准备。这正是他们被更激进的革命同志所鄙视的原因。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政府，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张政治面孔，都不是一党制。

如果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关系更和平，加之更关键的新经济政策，可能会让“多党制”的构想更有意义。然而这两个因素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巨大的紧张：布尔什维克们根本无法忘记1918年7月社会革命党造反，也无法忽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国内和国际上的重重困难使得“多党制”对布尔什维克掌权构成了巨大风险，而任何政党都不愿在内战胜利后主动交权下野。

总之，由于内战遗留问题和布尔什维克对新经济政策期间丧失政权的恐惧，布尔什维主义早在斯大林独裁统治前就实行了一党制。列宁强加给党的新经济政策要求为失去政治权力提供保险——尽管布尔什维克在新经济政策下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制高点”。因此，向一党制转变并不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固有特征，而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犯下的根本错误。从本质上讲，这是他们面对现有权力状况的恐慌行为。就列宁而言，这也可以归因于对权力的迷醉——他轻易获得权力（正如M. Heller的观点<sup>10</sup>）且非常担心失去权力，以至于不理解独裁统治的后果。列宁的行动既不能以环境为理由，也不能以“文明”国家即将发生革命的预期为理由。

9 译注：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死后被党中央谴责和否定。

10 M.Heller,A.Nekrich.Utopia in power.London,1986.

可以很容易地论证布尔什维克对权力的垄断必然导致一党制。我的反对意见是，如果没有一场血腥内战，如果1917-1920年间俄罗斯帝国政治舞台上各方势力争斗时**武力**并不是如此决定性和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没有敌对和侵略性的国际包围现实，布尔什维克可能会对至少两个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分子，以及一些地方和区域政党更加宽容。列宁在最后几年毫无疑问地认识到，苏维埃政权受到了可怕的、极其危险的“兵营”制度的威胁，这种认识可能不仅会催生增加脱产工人参与中央委员会或加强工人控制工业的天真提议。一旦列宁开始将新经济政策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通途而非退却，而且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自己的方法本可能引导他走向某种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这些想法确实没有得到大多数高层党员认同。他们的反对解释了为什么1923年向各省委员会发出秘密信函，否认列宁最后的提议，并暗示人们无须太重视这位病入膏肓的领袖的突发奇想。但我们应当看到这封信的本质：它是布尔什维克内部两种截然不同倾向之间斗争的开局之棋。列宁的威望足以推翻政治局决定（他经常这样做），改变政权的政治方向，尽管那些认为他是“障碍”的人也很顽固。我相信在这方面我父亲是党内第二梯队领导人的典型代表，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思维方式来判断党内主要倾向。在众多相互矛盾的意见、恐惧、悲观预测和对策中感到困惑的党员会听从列宁的意见，列宁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因为列宁见识更广，目光更远，理解更深。中央委员会和党代会上投票者数以百计，这些人在地方上做党的具体工作，并以决定性方式影响各自所在党委。实际上是这些人构成了整个党。

不难猜到，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属于那种认为人格特质往往起关键作用的人。特别是在俄罗斯，特别是在其历史上的动荡时期……

\* \* \* \* \*

新经济政策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能够容纳多部门经济。这种包容当然会影响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身，甚至可能改变其最丑陋的特征——我们后来看到的特征。为什么这种情况没发生呢？任何意识形态都是由人——通常是由少数领导人——来解释、遵循和实施的。我完全不同意某些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谓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受教育程度低。完全不是这样！因为这批人认为不读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今天叫“政治科学”）等全部学科是一种耻辱，哪怕他们没机会进大学学习。第一届布尔什维克政府可能是当时世界上知识分子最多的政府。党内高层绝大多数不是半文盲工人，而是具有大学背景之人（包括曾就读俄罗斯和西欧最优秀大学的前学生），他们除俄文外还能阅读两三种语言的书籍。

这些人也是人，当然也可以改变。这个论点尤其重要，否则在我看来就是把自己限制在“政治种族主义”中。如果否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可能发生改变，不仅使得改革的设计师成为历史幻影，而且如今利用这种“政治种族主义”的我国历史学家们，考虑到他们的过去（或至少是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过去），看起来也相当可疑。<sup>11</sup>

布尔什维克实践可能发生变化的另一个论据是（虽然可能性不大）：截然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来“证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这样做。随着以年轻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为主的布尔什维克理论的成熟，有利于社会发展而非历届领导人利益的思想能够在布尔什维克理论中找到合法性——就那么难以想象吗？

可以论证布尔什维克政府在1920年代非常接近于制定一项合理的经济政策，1926-1927年间该目标可能已经近在咫尺。然而在我看来新经济政策永远不会被保留延续。党中央当然辩论过这个问题，但结果却完全由斯大林一人决定。暂且不考虑列宁说斯大林“喜欢吃辣”的解释，让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要大幅度改变国家巨轮的航向？这里我们必然开始关注斯大林的主要兴趣：政治上凌驾于党的其他领导，在国内实行全面独裁。

我们不要忘记斯大林的“巨变之年”使国家经济猛烈倒退，苏联农业从此一蹶不振。尽管实现了工业化，但整个经济却遭受损失，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工业化的速度（结束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理由）被人为加快了，农产品短缺进一步阻碍了工业化进程。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采取更温和政策，工业化的速度会更加平衡。我们怎能相信没有其他选项呢？我们能相信除了让左手残废之外没有其他办法锻炼右手吗？

---

11 1990年我在华盛顿讲授关于改革的课程。听众中有一名智利军官说他永远不会相信任何共产党员能够从共产主义独裁和“意识形态扩张主义”转向民主。这位军官声称：整个改革过程纯属哄骗西方，“保守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不过是克里姆林宫策划的一场表演。他永远不会改变“最好的共产党员是死掉的共产党员”这一看法。对于一个参与皮诺切特政变和随后血腥镇压的人来说，这种想法可以理解。我有兴趣跟他谈谈，以便更好地了解拉丁美洲军人政权的洗脑机制。这是“政治种族主义”的经典例子。然而，在其他国家和其他人群中看到此类种族主义则相当令人悲哀。

虽然集体化的主要动机是动员更多剩余农产品，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任何一点剩余都消失了几十年。回想一下恰亚诺夫领导的经济学家小组吧，为什么党的机构不听取他们的意见？只因为有人认为他们的观点反社会主义。但同样可以想象，当社会主义国家在乡村寻找合理经济政策时，他们的观点也可能被视为大有裨益。1926年8月开始担任贸易人民委员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对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可能性印象深刻，以至于他在1927年党的“十五大”和其他会议上公开与斯大林辩论。米高扬发言支持贸易，认为这是从农村获得粮食的关键。直到米高扬意识到斯大林不是根据经济问题本身价值，而是作为政治斗争手段来解释经济问题时，他才跟上斯大林的之字形“总路线”。如果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建立了更持久的左翼反对派，斯大林自己本可以更长久地捍卫布哈林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农民的路线。

虽然布哈林是不亚于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但他的做法客观上导致了更复杂的权力结构和更宽敞的人文主义空间。尽管教条主义历史学家在布哈林的演讲和著作中发现了一些刺耳言辞，可事实的确如此。著作往往具有相当的欺骗性，演讲更能糊弄人。遗憾的是，当我们扫开图书馆的灰尘提取文献时，往往倾向于忽略过去的脉搏，忽略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时的目的和具体条件。我们甚至经常没有兴趣去了解信息的受众是谁，或作者希望人们如何聆听和理解。作者可能会写下几个激烈的段落，只是为了加入几句截然不同的、平和的、人性化的句子。许多作者的观点与教会的教条相抵触，但他们反复引用神圣经典起誓——人不仅可以用文字表达自我观点，还可以用文字掩盖自我观点，甚至将两者合二为一。这不仅是人日常行为的特点，亦是政治行为的特点，毕竟政治是人创造的。而人与机器不同，人会思想混乱，会改变或修改自己的想法，会发生难以预料的转变。也许这就是红衣主教黎塞留曾言：“给我任何人写的六句话，我就能找出罪名绞死他”的原因……

\* \* \* \* \*

斯大林获得党内领导地位之前，极权主义仍然存在争议。例如，关于工会作用的激烈讨论表明，当时确实存在发展工会主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可以阻止极权主义结构的巩固，类似于六十年后波兰出现的团结工会运动。党内其他讨论也使我们不能将布尔什维主义视作铁板一块。党活在社会内部，是社会的一部分，并非脱离新的苏维埃社会的重大问题而独立存在，这个新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是迈向未知领域。人们在寻找马克思未曾预料、但生活本身却创造出来的问题的答案时，提出了相互矛盾的想法。不同倾向可能会占上风，不同的人可能会影响发展方向。我不能完全同意这样的结论，即党内大多数人都支持斯大林最终宣布为“总路线”的极端主义路线。总路线本身会根据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变化。

从理论上讲，革命后的俄罗斯社会可能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促使我思考革命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于是我想到了早期基督徒的理想。难以否认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理论具有某些共同的乌托邦特征：保护穷人、被侮辱者和卑微者，肯衣衫褴褛不愿甘食丽服。这些都是千百万人所珍视的理念。毕竟耶稣曾亲自将兑换银钱的逐出圣殿，马丁·路德憎恨天主教会公然为贵族和富人服务，1789年法国大革命宣称：“和平归于茅屋，战争降临宫殿！”。布尔什维克向“无产者”发出呼吁有什么可指责的？至少这种呼吁本身不该受指责，人类对社会正义、平等（我们不要忘记1789年“解放”之后紧接着就是“平等”），以及任何社会中被遗弃者的尊严有着永恒渴望。假定所有被遗弃者和“无产者”都是乌合之众，都有攫取和瓜分财产的卑劣本性，并指责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从中分一杯羹——根本是不公正的。只有那些从来不曾属于或成功脱离了此社会阶层的人才会轻易做出这番指责。怎样更好地帮助穷人是另一回事，当然绝不应鼓励穷人瓜分被没收物品和土地的原始冲动。

毫无疑问，早期基督徒和早期布尔什维克在所容许的方法上存在巨大差异：后者果断支持使用武力（尽管列宁认为如果“统治阶级”放弃他们的统治地位，就没必要动武）。然而早在七世纪圣奥古斯丁就发展出一种允许为“正义事业”使用武力的理论，他甚至提出“正义战争”的名号，几个世纪后被说成是列宁创造的。那么我们回顾历史，基督教的神圣目标被用于什么样事业呢？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征服者”大屠杀美洲印第安人，诸如此类的事件需要单独写本书。我认为人类中一直存在忠实于早期诫命的人文倾向和一种强势的、侵略性的倾向。在意大利，有圣方济各与任性妄为的教廷；在西班牙，有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修士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当代拉丁美洲，有萨尔瓦多总主教阿努尔福·罗梅罗和顺从斯特罗斯纳总统的巴拉圭大主教们——到处都是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但不幸的是，人文倾向常常败北，早期共产党员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意图也遭遇了同样命运。现代历史和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类似的转变速度也在加快，这一点不足为奇。

让我们回到现代即1920年代。狂热主义最终取胜，正如许多作者准确指出的那样：对失去党内团结的恐惧胜过了追求民主的理念。但我们不应仅仅重复这一事实，更应该分析“党的团结”这个神奇的字眼在何地、对何人、出于何种原因如此重要。我们可以依靠回忆录、各级党的会议记录、新闻报道等来研究这些问题。我自己的结论是，党的整体团结并未受到威胁，但确实存在五个人之间激烈争权的“危险”，他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梦想着扮演列宁的角色。这些人将个人野心与国家命运混为一谈，将他们之间的争吵与党内分裂的危险混为一谈，将阴谋诡计与严重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混为一谈。这些

人假装他们的理论游戏和个人问题对国家的未来极其重要甚至具有威胁，从而将地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卷入权斗。诚然，当时国家的命运正在被决定，但绝不是以这些领导人所宣称的方式。

政治局成员之间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在苏维埃政权这样的历史实验中纯属正常现象。种种分歧本该通过理应拥有共同信念的同事之间的和平讨论来解决。在我看来，使党内讨论变成战场，进而造成整个国家悲剧的情况包括：

a) 不宽容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列宁与对手的理论斗争、他对“错误”思想的排斥，以及他保持党内理论和意识形态一元化的倾向。列宁掌权的时候这些斗争很少超越理论之争产生“组织”后果。然而他的继任者却很容易利用分歧将反对者逐出大门，并诋毁人家是“坏马克思主义者”或“坏列宁主义者”。

b) 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结构及其“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压迫下，任何煽动家都能轻而易举地赢得党内多数支持并要求对手完全投降。此外，后者还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民主集中制假定多数人永远正确。所以人们基本上被教导要撒谎——投票并不会改变他们的观点，但他们不得不假装观点已改变。

党的组织结构非常适合地下工作和闹革命，但对一个致力于建设新社会的党来说则完全不合适。在此我们必须把责任归咎于列宁，他直到为时已晚才明白这个问题，甚至想明白之后也没看到除了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之外的任何解决方案。<sup>12</sup>

c) 内战心理。这种心理助长了把那些在行动或决策中“犯错”的人妖魔化，而资本主义强敌环伺的想法则被用来把那些在严重国际危机时期“客观上”削弱了国家的人打成“异端”。

d) 狂热。1917年之前狂热对布尔什维克党有过帮助，内战期间也可以部分理解（尽管它导致了不可原谅的、冷酷的、过度的镇压），但它对党内和国家的民主具有破坏性。最终党和国家都无法摆脱狂热。

1920年代前半叶，党仍有机会放弃对抗社会（除工人阶级外，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认为俄国社会充满了起伏不定的、不可靠的“元素”）。然而当时地方党委领导人大多真心实意尝试发展国家、改善人民生活，并“加强与农民的联盟”。为了举例，我想描述一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俄罗斯东南部或北高加索地区的工作特点。后来这两个地理名词都用于指代从罗斯托夫州到格鲁吉亚边境、从新罗西斯克到达吉斯坦的广阔地区，人口约1000万。我举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为例，并不因为我父亲比其他地方党委领导人更优秀或更差劲——尽管两者都可能是事实。举他为例是因为我相信他是典型代表。

在“米高扬责任区”内住着一些被斯维尔德洛夫视为苏维埃政权死敌的哥萨克人，1919年斯维尔德洛夫曾要求他们服从布尔什维克政府，否则杀光光。1922年米高扬来到该地区，立即开始恢复哥萨克人的旧有地位、传统和自治权，甚至恢复了他们在盛装骑行时佩戴的传统马刀。他说服当地政府战争已经结束，哥萨克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公民，有权解决自己村庄(Станица)的日常问题。在莫斯科，米高扬坚持要求允许几千名哥萨克人从土耳其返回俄罗斯东南部，这批人是1919-1920年“白军”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兵败后逃至土耳其的。

本地崇山峻岭间分布着众多民族，绝非所有人都乐于接受新秩序。米高扬自然要帮助时任军区司令员的伏罗希洛夫斗争那些继续抵抗俄罗斯人的民族，但他的策略是将山地民族融入地区农业经济，保护他们的土地不受俄罗斯移民侵占，并吸引山区老少民众参与地方当局活动。考虑到民风素来尊重长者，他甚至坚持认为现在是时候选举这些民族的资深代表进入地方苏维埃了。认可苏维埃当局的部族成员被允许佩戴他们的传统佩剑，这一让步被证明极其重要。所有这些都发生在1922-1925年之间——为什么这种趋势未在全国范围推行并继续发展呢？

国际影响本可以成为促进逐步民主化的另一个因素。苏维埃俄国成了世界各地（尤其欧洲）左翼团体的圣地，这些团体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而活跃的作用，并带来了欧洲的政治文化。多达六万名工程师和工人奔赴苏联协助发展工业。这些人能够也应该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倡导文明方法。

实际上，我们本可以提前六十年实现改革。读完这些段落，一些读者无疑会说这是我一厢情愿的结论，甚至是在为布尔什维主义辩护。在否认后者的同时，我想说的是，布尔什维主义毫无疑问有责任创造可能性，甚至有责任鼓励一种与我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发展。简而言之，布尔什维主义为极权主义制度和独裁政权创造了条件，这些条件使斯大林主义现象得以发生。然而，我并不认为此事不可避免。爱德

12 这里必须指出，斯大林之所以能当上总书记，其实要归功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而非列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列宁一旦逝世，托洛茨基将是他们权力斗争中的劲敌，于是提议设立总书记一职。他们随后赋予书记处前所未有的职能，并任命斯大林担任此职，确信这样一个理论才干低下且毫无魅力的人不会给他们造成任何困难。加米涅夫显然还相信经过在西伯利亚的共同流放，斯大林仍然属于“自己人”。

华·卡尔<sup>13</sup>说历史学家喜欢在事情发生后才称之为“不可避免”，他是对的。如今正是这种方法在苏联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寻找规律性（“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或曰“合理性”）的传统仍然极具影响力。也许这是很自然的一一当代撰写苏联历史的人统统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将这一井然有序的理论教条与正常的常识相协调是多么困难……

\*\*\*\*\*

斯大林习气，或者说大清洗，已经在许多书籍、文章、回忆录、信件和日记中被无数人分析、讨论和描述过，所以很难再补充任何重要内容。尽管这方面我可以增添一些个人看法，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或许不止一个而是几个“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成为可能？为什么如此多对政府友好的政治团体被解散？为什么如此多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人被消灭？为什么如此多“生产指挥官”（国家发展所急需的）被清算？为什么如此多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不可或缺的军队将领被处决？

鉴于我们今天对这一时期的了解，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最简单的”。关键词当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内战遗留问题、面临敌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国家缺乏民主和法律、人民群众缺乏人道主义传统。这些都是当时实际情况，但斯大林习气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必然的！只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他肯定永远无法实现他的可怕阴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斯大林，这些条件不会全部成真。

为任何特定历史发展想象另一种场景，既难也不难。对于那些想象力丰富、准备编写自己剧本的人来说，不难。对于那些希望考虑所有主要参与者和以历史记录为基础，不考虑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又不忽视实际存在的可能性的人来说，很难。我不知道我的设想属于哪一类，但我是根据我所听到的、读到的和思考过的一切来设想的。

请让我从场景0开始设想：列宁并未死于54岁，反而多活了10-15年，而且身体足够健康，能继续有效地掌控局势。我相信我已经表达了我对他会做什么或试图做什么的观点。我对苏联社会如何以不同方式发展的设想是基于社会民主的理想。布尔什维克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记忆犹新，与第二国际的联盟在八到十年前才被打破，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忽视社会民主党在世界上的重要支持。正是列宁打破了国内外的这一趋势，也正是列宁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政治方向转向与社会民主党人结成新联盟。（写完本文初稿后，我发现了一位支持这一假设的人：亚历山大·齐普科。齐普科发表在《道加瓦》杂志的一篇文章说：“……我们的革命转向列宁临终之际所描绘的社会民主现实主义，可能会取得很好效果。”<sup>14</sup>）

在这番设想中还应加上一个重要“细节”：党的最高领导层不会与1924年相同。毫无疑问，斯大林将被排挤到无足轻重的位置，布哈林的重要性会上升，党的高层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面孔。没人说得清“新面孔”具体是谁，但我想到了基洛夫和伏龙芝（我相信他不会因一次溃疡手术的所谓“麻醉过量”意外丧命）等人，也许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党务工作者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商人”代表。

列宁喜欢能把事情真正办成的人，不仅擅长演讲，还会组织具体工作。因此我认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类的人机会渺茫。新一代领导人本可以更好地改变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盛行的教条主义、僵化和狂热。可遗憾的是，一个人健康状况不佳这种小小的历史细节并不能通过任何形式的“规律性”去“修正”。相反，它使整个社会注定进入下一个场景，即场景1。<sup>15</sup>

场景1就是客观发生的历史现实，它给苏联和苏联以外的许多国家带来不幸。斯大林成为苏联领袖，统治着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和略少于2亿的人民（即使不算富农及其家属）。

党内清洗和随之而来的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加强，以及大规模驱逐“富农”，为后来的“悲惨收获”打好了前站。斯大林自己也明白：重要的是这些可能实现。他终于能够开始策划消灭那些他害怕、憎恨、鄙视、羡慕、单纯不喜欢、认为知道得太多或不够顺从的敌人了。虽然眼下还不容易，但他已经牢牢掌控了毁灭机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经进入了独裁者的角色。唯一缺少的因素是一种大众癫狂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简单。希特勒的例子令斯大林茅塞顿开：他意识到即使是德国这种政治发达的文明国家，也可能沉浸在仇恨和歇斯底里之中。

---

13 译注：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英国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

14 《道加瓦》杂志，第7期（1990）

15 下面的文字绝不是模仿阿纳托利·雷巴科夫作品。而是本人1950年代中期通过与父亲和其他常来我们家的、以及我亲自造访过的老布尔什维克的交谈得出的认识。他们包括：奥莉加·沙图诺夫斯卡娅、列夫·绍米扬、阿列克谢·斯涅戈夫、我的叔父阿尔乔姆·米高扬、H.图马尼扬、A.阿尔祖马尼扬、曾任党的十七大计票委员会委员N.安德烈西扬（我父亲学生时代的朋友）等人。这些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曾经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刑讯室和古拉格劳改营受过折磨。

当然，“斯大林习气”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害怕失去权力。此人非常了解他的党，没有被歌颂他的大合唱哄得飘飘然。即使在托洛茨基被流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被解除领导职务之后，斯大林依然知道党的内在力量。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和其他许多人眼中自己十年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知道自己不像其他许多著名党内精英那样会说、会写、擅长推理。他知道党员们自视甚高，有权选举或不选举某个领袖。而且投票是秘密进行的！最后，他也无法排除“宫廷阴谋”的可能性，即利用政治局决议对付他。斯大林很清楚多少人讨厌他，或至少认为他不是最佳人选。

斯大林密切关注政治局的新面孔，他对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很有把握，不忌惮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安德列耶夫和米高扬，但对鲁祖塔克没有把握。后者根本没有野心，但政治局其他委员都知道列宁曾非正式地提议由他接替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斯大林对乌克兰人：斯克里普尼克、柯秀尔、波斯蒂谢夫和格林科也不放心。而他最害怕的无疑是后起之秀基洛夫，所以试图驯服他<sup>16</sup>。《真理报》（主编是斯大林的忠实仆人梅赫利斯）上发表了一篇“小品文”，说的是某位党内大员带着一条大狗从巴库来到列宁格勒，希望要一套大房子（米高扬回忆说：虽未点名，但都知道是谁）<sup>17</sup>。然后，在1913年的一份北高加索旧报纸上发现了科斯特里科夫（基洛夫的本姓）的一篇文章，可以解读为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是谁在寻找基洛夫的微过细故，秘密审查他写的、讲的、做的一切？谁下的命令？在不同的人提出几个问题之后，政治局甚至开会讨论过，斯大林本人建议不必大惊小怪。米高扬评论说：“这就是他的手段！”。

基洛夫在政治局会议期间相当被动，通常不对讨论的事项发表意见。这种低调甚至奇怪的行为无法让斯大林放心，也无法蒙骗他。难道基洛夫在群众集会上发言时不是像大家描述的那样情绪激昂、言辞犀利吗？决定性时刻终于到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34年春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基洛夫获得3张反对提名他担任中央委员的投票，而斯大林获得282张赞成票。当然，负责十几个计票委员会的扎通斯基和代表大会主席团监督这些委员会的卡冈诺维奇与斯大林进行了秘密磋商，正式宣布反对斯大林的票数也是3张。此外二十多名地方党委领导人找到基洛夫，表示愿提名他担任总书记。诚然，基洛夫本人将这一提议告知了斯大林，并说他已拒绝，但……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一个姓尼古拉耶夫的人枪杀。几周前该尼古拉耶夫因持有枪支和自绘的斯莫尔尼宫地图被拘押多日，但雅戈达新任命的列宁格勒政治保卫局副局长释放了尼古拉耶夫。暗杀发生后——甚至调查开始前——媒体就指出幕后主使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中心”。群情激愤很容易变成集体歇斯底里。“大清洗”开始了<sup>18</sup>。

我认为其他情况同样可能发生。例如**场景2**：托洛茨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此人对国家实行民主并不特别热衷，尽管他对自己的党内权威感到满意，自信自己是本党最知名且最能言善辩的领袖。在**场景2**，党内成员未被大清洗，仅极少数腐败分子例外（他只把那些严重威胁他个人权力的人开除出党）。至于对待党外人士，他就没那么严苛细致了。新经济政策虽被削减，但由于党内有以声望日盛的布哈林为首的反对派存在，其削减速度和力度不及斯大林时期。农民没有获得特别关怀，每当政权在粮食征购方面遭遇阻力，依然使用强制手段而非经济激励。农民再次成为工业化所需资本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党内反对，其反农攻势的规模无法与**场景1**相提并论。托洛茨基本人无法容忍这种规模和性质的镇压，党内反对派迫使他或多或少保持克制。执政几年后，托洛茨基落选总书记，国家采取更温和的“总路线”（我在这里不同意亚历山大·齐普科的观点，他认为托洛茨基绝不会允许自己被正常党内程序免职<sup>19</sup>）。继任总书记最可能是尼古拉·布哈林<sup>20</sup>，虽然也有可能来自新一代党内领导，就像前面设想的**场景0**。

**场景3**：1926年当斯大林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辞职时，领导层没有因忌惮托洛茨基和党的分裂而让步，反倒想起列宁的非正式建议，遂选举鲁祖塔克接任总书记。此人当选，事实上恢复了党内派系的存在。鲁祖塔克是一位温和政治家，对“总路线”并不那么执着，倾向于在采取任何重大措施之前进行尽可能多的讨论。地方党委领导逐渐习惯了少强调上级指令，更多地寻求合理妥协。最聪明的党员——那些与普通人民利益关系密切的人——得以留下，教条主义者失去声望和选票。宽容异议的氛围遍布全党。新闻媒体向全国报道党内讨论情况——“开放政策”发挥作用。出现了新的、活跃的地方和中央领导人，

16 “驯服他”是我父亲的原话，我没听懂，他解释说：“镇住他”。

17 译注：1921-1926年基洛夫任阿塞拜疆党委第一书记，之后到列宁格勒任州委书记。

18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和西方历史学家一样希望能有更多实质性具体证据来证明斯大林在基洛夫谋杀案中的罪责。直到今天，这种证据还只能通过跟死者通灵对话获得。然而我们决不能忘记，在中央委员会档案中还保存着与一些斯大林没来得及杀掉的人的厚厚访谈录，以及党的监察委员会1950年代末整理的许多其他材料。监察委员会原委员奥莉加·沙图诺夫斯卡娅告诉我，这些材料颇能证实斯大林的罪责。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曾希望在基洛夫诞辰100周年之际出版材料，但在1986年的政治环境中这样做太困难了。让我们等待吧，机会总会到来。

19 《道加瓦》杂志第7期，1990年

20 本文几乎写完之后我才读到亚历山大·齐普科在《道加瓦》上发表的上述文章。因此，当我看到我的同事和朋友殷切希望如果布哈林能成为党的领导人，我们的国家就有很大机会避免那些导致国家发展偏离方向并形成丑恶社会的灾难性巨变时，我感到既惊讶又高兴。

他们受过教育、口才出众，既不教条也不狂热。这些党员跟官僚机构作斗争虽不轻松，但比六十年后要容易许多。

基洛夫凭什么不可能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他不能在暂未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时启动改革？那个时候改变“总路线”比1980年代和1990年代容易百倍啊。回首早期岁月：党内讨论的所有事项都拿出来让报刊、知识分子、农民积极代表、新经济政策商人等公开讨论。新经济政策本可以继续作为大政方针并演变成为一种稳定的发展方向。在轻工业和服务业中，随着私营部门的增长，混合经济将会扩大，这必然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党内派别将开始扮演反对党角色，吸引有影响力的党外团体和个人。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将会出现，起初可能比较谨慎，然后逐渐越来越公开。

**场景4：**布哈林成为党魁，新经济政策被正式宣布为“总路线”。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场景3**（斯大林辞职、鲁茨塔克当选）相同。我想指出，这样的发展也可能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共产国际就不会疏远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E. 台尔曼和德国共产党不会猛烈抨击他们，而会理解真正的危险来源。谈到这儿遇到了一个我不敢讨论的问题，因为我对1931-1933年的德国所知不多：在这种情况下，纳粹还能够崛起掌权吗？

除了**场景1**，这些设想无疑都有缺陷。然而声称斯大林主义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同样不靠谱。我无法相信只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斯大林主义而言，不可能想象出更糟糕的替代方案。因此我排除了斯大林缺席的斯大林习气的可能性。可以想象出现某种托洛茨基习气，但它永远无法与我国实际经历的“悲惨收获”相比。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实际“收获”如此巨大，如此疯狂，如此过度——即便斯大林渴望绝对独裁权力、消灭他想消灭的人。（在此我可以为大清洗统计数据提供一些贡献。我父亲告诉我，1962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克格勃向党的监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1935年1月1日至1941年6月22日期间被枪决人数为700万，被逮捕、送往古拉格等的人数为1270万）

人们可以描述造成恐怖的多种原因，但无法确定每个原因在最终结果中所占的比重。我们必须牢记，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共产民主派”、俄罗斯爱国者，甚至马克思主义的凶猛敌人，都不认为应当单独强调某一种原因。毫无疑问，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没有布尔什维主义及其领袖列宁，就不会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苏维埃政权和在俄罗斯执政的共产党。少了这个基础，斯大林永远无法命令枪决任何人。

遗憾的是这一切在俄罗斯都被证明是可能的。俄国历史与斯大林习气有直接关系。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俄国革命蛋糕的面粉还没有磨好，此论完全正确。尽管列宁认可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但他错误地写道在他的党的领导下，俄国社会有可能“做好准备”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十月革命太早了。革命引发内战后，布尔什维克自然试图取得胜利，而在取胜后他们又面临着革命不成熟的矛盾。只有德国、匈牙利和其他文明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才能解决苏联社会日益严重的困境。

但如果要责怪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国家催生了能够实现马克思许多设想的社会民主党而无流血牺牲，但在其他国家却造就了波尔布特（柬埔寨）、毛泽东（中国）和金日成（朝鲜）？再者，德国的希特勒、海地的杜瓦利埃、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智利的皮诺切特、乌干达的阿明、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1964年印尼的“雅加达事件”又该如何解释呢？也许人类缺少一种关键基因，这种基因能阻止动物——甚至猛兽——自相残杀。

所以更应该责备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是列宁本人。列宁在范宁·卡普兰枪击他之前就已经开启“红色恐怖”了，并宣布这种恐怖为官方政策。最近苏共中央机关报刊登文件，揭露列宁下令成立军事法庭并处决15000名神父<sup>21</sup>。诚然，当时东正教会既是君主制的、也是最保守、最无情的“白军”的顺从仆人，神父的活动可能严重威胁新政权，但这一点并不能为在未经最严格调查每个人罪行（如果有的话）的情况下枪毙所有人开脱。何况列宁还受过法律教育呢！

不过列宁主义不能简化为“红色恐怖”。如果认为1930年代的斯大林（观其行迹而非听其口号）是“他那个时代的列宁”，既是把这个词简单化了，也低估了斯大林的个性。内战期间，当一个新政权面临致命危险而实施恐怖是一回事（尽管我仍然认为它不合理），但在没有真正危险威胁到政权时进行大清洗绝对是另一回事。基于大清洗而推论说1930年代的苏维埃国家仍然脆弱是不正确的。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我认为这两个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其俄文缩写 РСДРП 知名）的一种政治倾向，孕育了关于苏维埃国家未来发展的不同思想。列宁最后的行动和著作旨在鼓励这种发展的更“自由”版本。

21 《消息报》1990年第4期

列宁 1921 年 8 月写信给加夫利尔·米亚斯尼科夫，说：“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很可笑的”<sup>22</sup>。1921 年 12 月至 1922 年 2 月列宁提议并实现了将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变革，对秘密警察的专横行为加以重大限制，规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拘留审讯嫌犯不得超过一个月，到期必须送交法院，且未经法院宣判不准执行死刑。也许这看起来只是对法律基本要求的天真、朴素的尊重，但在当时它标志着一项非常重要的进程的开端，而列宁打算继续这项进程。这是一条通往法律秩序之路的开端，这条路六十年后才最终实现。

我相信苏联社会及其统治精英已经做好准备接受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为什么俄罗斯共产党允许最可怕的情况发生？斯大林偏执猎杀人的生命、幸福和尊严，却丝毫不顾及对国家的“危险”。相反，他的行为在十年内给国家带来的伤害比本世纪任何国内、国外危险（甚至两者相加）可能造成的伤害更多。为什么俄罗斯允许斯大林把人命变得贱似蝼蚁？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了这场血腥屠杀，践踏人类尊严，让一个大活人不如牛马金贵（牛马尚且得照料，人进了古拉格注定饿死）？为什么俄罗斯几十年间法治废弛、人权沦丧、不尊重“神圣”的“人民”一词，却仍能轻松存在？为什么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我担心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他们有权决定别人的未来、生活、自由和财产处置<sup>23</sup>？这些问题才是对科日诺夫和其他“俄罗斯爱国者”的真正回答。

要我说，当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痛苦感叹：“可悲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从上到下全部是奴隶”时，更像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列宁引用他的话，认为是充满决心去改变这种社会条件的积极爱国主义的典范。安东·契诃夫曾言他已经“把奴性从自己身上挤干净了”。

或许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去世后斯大林主义继续存在几十年？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遗产，但这答案并不令人满意。比如，为什么经历了六年改革后，在上层权威几乎消失，任何有决心、有活力的人皆能够实现一切的条件，斯大林遗产中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依然存在？为什么集体农民普遍反对那些拼命工作、给国家提供食品并赚取报酬的少数单干农民？为什么农村人口大多支持比沙俄时期的地主更坏的集体农庄主席？集体化的精神一定根植于俄罗斯农民的某些特质中，很难相信单靠保守派的抵抗就能阻止现今的地方群众运动。

当然还有斯大林主义遗产的其他例子。整个体制仍然与地方党委相连。但假设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别无二致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很少有人愿意在把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相提并论的时候辩囿布尔什维主义。今天的人们比内战后更坚定地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独立行动者。俄罗斯人民往往保守，可他们一旦行动起来就难以停步。这或许解释了许多过去和现在的事情，无论这样的解释能否让“俄罗斯爱国者”满意。

\* \* \* \* \*

---

22 俄文版《列宁全集》第 44 卷

23 请允许我就此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两年前在某次公开讨论中，我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和赫鲁晓夫的儿子不应该写文章或在任何集会上发言。相反，你俩都应该因为你们父辈的罪行被监禁。”我像往常一样大声朗读了这张纸条，并问听众们是否觉得这种想法与斯大林杀害和/或监禁“人民公敌”的老婆孩子的政策有任何不同？大多数观众建议我无视这种意见，但如果这种意见没有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现实（据说已随着斯大林进坟墓了），我也不必理会。我不禁回想起已出版的目击者和受害者记述，他们说当年产科诊所的护士拒绝帮助“人民公敌”的杂种后代分娩！

## 结论

最后，我想针对西方广泛流传的一些观点提出反驳。例如，我不同意斯大林成功是因为他获得了对其极端政策的广泛支持。我想指出的是，很少有历史学家注意到斯大林开始获得声誉是通过反复宣称自己在理论上多么多么谦逊（这是真的），以及他只是列宁的忠实追随者（我认为这不是真的）。列宁的名字是他在这场游戏中的赌注，这为他赢得了党内初步支持及那些对列宁这位俄罗斯和世界历史上真正杰出人物印象深刻的那部分民众的拥护。然而按照当时的标准，内战后的列宁不再是“极端主义者”。虽然极端主义在某些布尔什维克团体中确实强势存在，但新经济政策已经开始安抚任何仇视“私有制”的人。

我也不相信斯大林是通过忠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而获得党的支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发明”或“发展”，足以让马克思在坟墓里翻身。还必须强调的是，斯大林从不严格重视言行一致，他说的、写的和做的事实上往往相悖。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找到矛盾语句就像在基督教圣书中找到矛盾语句一样容易——斯大林根本违背了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我们必须记住，从各方面来讲列宁之于党都比马克思更亲近、更重要。

我也不接受某些历史学家提出的观点，谓：斯大林注意到了恩格斯或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合作生产”的思想，或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将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论点。我们很清楚，斯大林认为强迫人们工作比鼓励人们优质工作更有利可图，他强调的是就业者数量而非质量。这进一步证明斯大林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说“封建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很难理解（在我看来只有1945年之前的日本算封建资本主义，但我对这个国家了解不够，无法做出判断），那么“封建社会主义”如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相协调就更难理解了。

许多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存在一个普遍问题，即如何定义“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某些情况下这个词指的是1922年政治局，而另一些情况下它包括所有革命前入党的党员。这里头的差别可大了！还有一种理论将“老近卫军”定义为包括革命后立即成立的中央委员会，或者中央委员会加上几百（或几千？）名地方和党中央的“积极分子”。每次使用这个术语时，这些不同的定义都需要具体阐明。

至于斯大林究竟是自下而上领导或自上而下领导的问题，我认为答案一清二楚。毫无疑问，允许党员（或仅限政治局委员？）表达自己意见，但在重要事项上采取行动必须获得斯大林本人的明确许可。任何未经他批准就尝试做重大决定的行为，即使是属于自己人民委员（或部长）权限范围内的事项，都会被斯大林视为思想和行动上危险独立的证据。也许1930年代初期这种传统尚未形成，当然，绝对驯服的最严苛时期是1937-1939年，而最宽松时期是1941-1945年。但总的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前，没有人能够独立做出任何重要决定而不受某种惩罚。

说到斯大林要求的服从，请允许我举个例子。1944-1945年冬季白俄罗斯领导人请求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从国家储备中借给该共和国一些种子粮，以备明年春播。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刚刚脱离德国占领，正面临种子短缺问题，他们承诺将多归还30%的粮食。当时米高扬负责这方面事务，他认为首先，应出借粮食，因为这样该共和国的收成会更好；其次，国家的粮食储备也会增加。他没有禀报斯大林——或许希望斯大林永远不知道吧。无论如何，这个决定看起来十分明智。岂料有人将此事告知斯大林，斯大林火冒三丈，撤销米高扬的决定，并亲自书写一份政府法令剥夺了米高扬的粮食事务管理权，理由是他“挥霍国家财产”。但不久之后米高扬再次被委任管粮食，因为接替他的莫洛托夫“显然没这个能力”（米高扬对莫洛托夫作为工人的评价相当低）。另一个例子是1950年代初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镇”的讲话（尽管是个相当乌托邦式的想法，但毕竟是他自己的想法），斯大林指示《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严厉批评这次讲话。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还记得，奥尔忠尼启则去世前他俩能够共同决定许多重要问题，斯大林仅仅要求知情而已。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对任何人采取独立行动的容忍度越来越低。米高扬回忆说：“不过，当他得到适当的通知时，一般不阻碍我们的工作。”

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著作中另一个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领域是“专家”在苏维埃政权中的地位。我想说存在两种对待专家(специ)的态度：一方面是忽视、羡慕，甚至嫉妒；另一方面则是敬佩和重视他们的意见，有时甚至会帮他们辩护，免受批评者的“革命辞令”（列宁语）。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生产指挥官”——如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扎维尼亚金、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拉扎尔的哥哥，曾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因“间谍罪”被捕当天自杀）、万尼科夫、捷沃相、金兹堡、马雷舍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米尔恰科夫、克里莫夫、图波列夫等——都持后一种态度。持前一种态度的主要是被提拔为领导的先进工人(выдвиженец)，安排这类人当官的时候常常未全面考虑其能力或知识。他们的态度可以被理解为

出于自卑感，因为许多人不是通过做学徒学会了真本事（其中一些人明白学徒制的必要性），而是通过批评专家缺乏果断、行动迟缓以及无法理解“党的需求”而平步青云。这种态度导致许多优秀专家沦为镇压受害者。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未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当他于1926年来莫斯科接替列夫·加米涅夫担任内外贸易人民委员时，获得了许多老专家的巨大帮助。那年夏天他三十岁，曾顽固抵制斯大林提拔他担任该职位并同时让他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意图。大约六个星期里他与斯大林和李可夫互通愤怒的信件和电报，对方争辩说他的名字是多位中央委员提议的。而他不愿就职的原因显而易见：米高扬认为自己无法胜任全联盟甚至国际性的工作，尽管他已有大量经验，但这些经验仅限于一个领域。最终他被迫接受提名（登报公布了不得不接受！），他意识到如果没有专家们的持续建议和指导，他将无法达到他一贯的工作水平。这种对待专家的态度持续多年，延伸到米高扬未来的各项工作中。

另一个插曲也与斯大林有关，值得特别注意。1945年底或1946年初，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贸部长的米高扬正在莫斯科迎候艾德礼政府的新贸易部长哈罗德·威尔逊，两人计划讨论苏联欠英国的战时债务问题。贷款利息相当高，我父亲煞费苦心研究如何解决。在做出重要决定或进行谈判之前，他总是邀请专家参与咨询，开会自由讨论任何问题。这一次米高扬直接问：“我们怎样才能换取更优惠条件？在与英国部长的谈判中可以提出哪些问题，采取什么措施？”顾问团中有一位老教授姓马伊，他告诉米高扬：“我不了解债务问题的政治意义，但法国欠英国的债务利息比我们低得多，差额高达几亿英镑。”米高扬十分重视，表示“政治方面的工作我负责”，并要求提供全部精确计算数据。然后去斯大林办公室详细汇报。

斯大林对此持怀疑态度，甚至不建议米高扬把利息问题摆上桌面谈，因为他根本不信英国会同意在战争初期签署的协议上让步。尽管如此，米高扬仍然坚持尝试，认为试一试总没坏处。斯大林说：“好吧，试试吧，但你会发现我是对的。”随后举行会谈（谈判背后的这些故事不仅是我父亲讲的，而且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英国首相身份访问莫斯科的哈罗德·威尔逊先生告诉我的。威尔逊公开宣称米高扬是他贸易谈判中的师傅，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新闻界不允许发表这种言论，甚至威尔逊的电视采访也被“编辑”了，删去了他承认米高扬的内容），米高扬在谈判中的主要论点是：苏联为打败希特勒所做的贡献是法国无法比拟的，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区别对待两个盟国的贷款呢？威尔逊争论了几天，飞回伦敦向艾德礼和内阁报告，又返回莫斯科，最终表示“同意”。斯大林大吃一惊，当然也很满意。

威尔逊事件及米高扬在1926年和1938年两次拒绝晋升（当时他拒绝出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帮助我们部分理解了为什么米高扬能够在大清洗中幸存下来。那时候服从斯大林是绝对必要的，但这并不能单独解释米高扬何以幸存。我不认为米高扬是斯大林的“总督”，也不觉得他认为有必要通过直接参与镇压来证明自己忠于斯大林。事实上，斯大林只让他直接参与过一次镇压行动，当时他派米高扬和马林科夫带着他写给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前往亚美尼亚。一天后贝利亚从第比利斯赶来与他们会合，这让人怀疑斯大林并不认为米高扬是镇压行动的热心支持者（虽然米高扬必须在当地内务机关提供的“已证实人民公敌”名单上签字，但他敢于划掉几个名字，只可惜没能救回这些人）。或许正是基于同样原因，米高扬才不得不在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

在经济和其他专业问题上服从斯大林并不妨碍讨论，只要你有这胆量。的确，某些人宁愿不争论，例如马林科夫就从未与斯大林争论过，尽管他和斯大林非常亲近（他始终对斯大林怀着一种恐慌性的畏惧感）。米高扬甚至在重大问题上也敢争论，比如当马歇尔计划宣布后，时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的贡纳尔·默达尔来莫斯科讨论苏联参与该计划的可能性。米高扬告诉默达尔，他完全支持这个想法，又说：“但你明白，这种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所以咱俩过几天再见面吧。”1978年默达尔在斯德哥尔摩与我谈话时告诉我，虽然没提斯大林的名字，但他知道米高扬必须找谁请示。

父亲早些时候给我讲过同样的故事，他说他花了好几个小时试图劝服斯大林加入马歇尔计划。我引用父亲的原话：“（斯大林）唯一的反应是：‘我们将依赖西方。’我徒劳地争辩说我们在政治上已经足够独立，有了美国的帮助，我们将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新的技术水平恢复国家欧洲部分的经济——那里已是一片废墟了。这只会使我们更加独立！虽然斯大林是个聪明人，人家给他解释经济问题他能理解，但他也可能固执得像头驴，甚至到了傻子的程度”。

米高扬未出版回忆录讲述的另一个例子同样表明了斯大林的固执，说的是斯大林如何迫使他出售苏联通过战争赔款获得的奥地利加油站网络。米高扬当时负责总管对外经济联系，包括著名的苏联海外资产管理局（其最重要资产是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铀矿）。他争辩说，奥地利的这些加油站是靠运气获得的，每年都将快速为苏联带来不断增长的硬通货利润，这种机会一旦失去将永不再有。但斯大林显然反感任何可以避免的与外国的联系。

再举最后一个例子。1941年7月米高扬命令几列装载粮食和其他食品逃出沦陷区的火车直奔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得知米高扬的命令后，懒得与米高扬商量，直接找斯大林抗议。日丹诺夫争辩说该市仓库不够用，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了充足粮食储备。此时距离列宁格勒900天大封锁只剩两三个月时间！父亲告诉我，他当然没有预见到封锁，只是认为这样一座大城市可以把许多建筑（如电影院、室内体育馆、博物馆和宫殿）充作仓库使用。如果列宁格勒真的不需要储备粮，那么从列宁格勒向其他地方分配粮食也很容易。斯大林打电话告诉他日丹诺夫的反对意见，米高扬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但斯大林拒绝附议，说：“日丹诺夫比你更了解他的城市和它的需要<sup>24</sup>。把这些火车开到其他地方去吧。”

写在这儿我必须就“雅科夫列夫的斯大林”补充几句。这位著名航空设计师的回忆录被认为是亲斯大林的，至少，包括雅科夫列夫的同事：米格战斗机设计师阿尔乔姆·米高扬在内的两位米高扬都是这样想的。我重复一遍：虽然斯大林能够理解合理意见并做出正确决定，但他同样能够不听取合理意见并做出错误决定。关于雅科夫列夫面临的恐惧和阴谋氛围，阿尔乔姆·米高扬讲过与此人命运攸关的一次大事。当时众人在斯大林办公室开会，空军司令员报告说新型号雅克-3战斗机在空中不断失灵，原因是覆盖框架的织物碎裂<sup>25</sup>。雅科夫列夫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尝试修复这个问题屡屡失败。

斯大林听完报告，用最咄咄逼人的语气说（一旦他这样讲话，人通常只能再过几分钟或几小时的自由生活）：“雅科夫列夫同志，您为谁工作？为我国还是为希特勒？”众人鸦雀无声，雅科夫列夫脸色煞白、目瞪口呆。阿尔乔姆·米高扬挺身挽救局面和雅科夫列夫，起立大声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向您保证一定查明真相。给我们两周时间。”他说“我们”，首先意味着一旦失败他也将自动承担罪责。斯大林不答话，余怒未消，然后说：“你们只有两周时间。好好记住。”随后一群设计师飞往主工厂，仔细审视雅克-3的每个生产阶段。他们像普通检查员一样每天工作18个小时，终于发现机身上部使用的卡其布是用一种油漆覆盖的，这种漆无法抵御1941-1942年冬季严寒，尤其高空飞行时。

斯大林死后这种情形依然存在，只是威胁的程度发生了变化。一把手的“唯意志论”继续发挥作用，阴谋诡计并未消失，赫鲁晓夫夺过了摧毁政治对手及其追随者的习惯做法，显著区别在于无人被逮捕或枪毙。然而，决定往往是单方面作出的。奉承赫鲁晓夫的人稳操胜券，不顾赫鲁晓夫的愤怒坚持己见的人要么被迫把工厂和设计局交给竞争对手，要么被委派到(назначении)其他工作岗位，要么退休。例如“太空冒险家”弗拉基米尔·切洛梅成功削弱了苏联航天进步之父谢尔盖·科罗廖夫的声望和权威，切洛梅在自己的“公司”雇用了赫鲁晓夫儿子谢尔盖，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好糊弄的工程师。通过把谢尔盖塑造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切洛梅简直迷倒了赫鲁晓夫。我们不要忘记，像海军上将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这种有原则的人曾两次被降级：一次是1940年代末被斯大林降为少将，一次是1950年被赫鲁晓夫降为中将。这些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直接流毒。

观察苏联的农业政策也可以清晰看到这种流毒的危害。须知1953年赫鲁晓夫第一个想起斯大林统治下农民的悲惨命运，采取了重要措施，使农业生产得以提高，并将农民从实际上的农奴状态中解放出来（许多西方专家错误地把这些变化归功于马林科夫，而马林科夫只是在最高苏维埃讲了一通话）。然而七、八年后赫鲁晓夫又企图剥夺农民自留地，这是连斯大林都从未尝试过的限制。这就是斯大林主义方法的力量，既体现在重大决策方面，亦体现在对长期受苦的俄罗斯农民的态度方面。

我也必须否定所谓斯大林本人“不知道集体化的规模和残暴”的观点。我们绝不能低估斯大林在加速强制集体化中的作用，他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Головокружение от успехов)不过是此人的一贯虚伪罢了。关于这种虚伪我们有成百上千个例子。“去富农化”需要如此多的士兵、如此多的部队和全国范围内各种协调运输手段，涉及如此多的地区（不仅实施集体化的地区，还有富农及家人被重新安置的地区），所以如果说斯大林不知道这次“行动”的规模，简直荒谬绝伦。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谢尔盖·斯涅戈夫，他曾在乌克兰工作，目睹了一次奥尔忠尼启则与当地党委领导的对话。这名乌克兰人早年认识谢尔盖，所以坦白说自己没有努力执行莫斯科下达的每一条强硬措施，也没有加快进程，提交的报告亦不准确。奥尔忠尼启则回应说：“你是对的。不要太在意那些远方的人发出的命令，他们比你更不了解本地情况。”

我承认斯大林广泛利用了民粹主义，但很难接受农民对斯大林制度的传统消极抵抗有任何意义。我看不出农民如何超越斯大林的权力。更不可信的是，有一种理论认为斯大林按照自己意愿创建的、效力于他并且为整个党和国家机器带来利益的制度，最终比斯大林本人更强大。斯大林主义就包括了斯大林和制度。最后，岂能用“技术保守主义”来解释斯大林主义？技术有其自身规律，人类无法克服。除了那些将地震也归因于他们“伟大领袖”的人。

24 译注：日丹诺夫时任列宁格勒州委及市委第一书记。

25 当年北乌拉尔的铝工业正在我父亲指导下紧急创建中。他是根据斯大林的直接命令监督这项工作的，米高扬对这项任命感到惊讶，提出异议说他对冶金知之甚少。斯大林的理由很简单：“你能办好。”我父亲若有所思地补充道：“基本上，他相信我能办好任何事情。”

还有一个小插曲从心理角度揭示出斯大林对自己权力的感受。某年8月份，斯大林与米高扬在他位于昆采沃的“近郊别墅”花园散步，斯大林指着空地说：“我想在这儿种一棵柠檬树。”米高扬回答：“这儿不能种柠檬树，第一场霜冻就死了。”斯大林坚持己见：“不，它会长大的。”米高扬暗想：“奇怪，这人看上去挺聪明，怎么胡言乱语呢？”我认为这段插曲揭示了斯大林的内心信念：大自然服从他，或者说应该服从他。最后，种下的一棵柠檬树深秋时节开始枯死，斯大林为了挽救这棵树，下令在周围建起一座温室（也可能是瞒着他另栽一棵健康新树）。这难道不是斯大林与大自然作斗争以及他希望相信自己总能赢得斗争的证据吗？

最后，我坚决不同意1934-1937年党内冲突时斯大林“态度超然”的说法。我认为很显然斯大林在幕后亲自制造了这场冲突，进行组织和策划以便为即将到来的打击做准备。我也永远不会接受斯大林不应该为大清洗负责的论点。部分学者认为，虽然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难辞其咎，但他个人的作用并不能解释大清洗，就像毛泽东的作用不能解释中国文化大革命一样。我了解我的国家，也了解斯大林，至于中国和毛泽东，我只能做间接判断。但我知道斯大林凭借自己炉火纯青的“共产主义”专政制度轻而易举地操纵群众，这种制度给了他独特的机会，使他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奴役人民。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的奴隶，我证明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被迫做任何事。但他们却真心相信自己是出于个人意愿履行职责，执行党（比如身为领袖的他）希望他们做的一切。人们没有出卖灵魂，而是自豪且喜悦地把灵魂当作贡品献上。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大众精神病的“临床病例”，整个国家就像一座巨型医院。也许读者会觉得这是个悖论或阴暗笑话，但今天没有谁能说服我承认自己曾是正常人，我的思想和行为是被历史环境预先决定的。我们俄罗斯人今天得以回顾过去，评估我们几十年前的思想、情感和执迷。纵然没有教科书或研究专著的虚假安慰，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民族被一位邪恶的天才独裁者强奸了。

至少在今天，苏联普通民众掌握了越来越多关于斯大林及其政权的信息（唉，这些信息在西方仅少数人愿意阅读）。谴责斯大林已不再是“御用作者”的特权，这一进程已超出任何一个人的控制范围。“去斯大林化”的过程确实产生了一些错误，如情绪化和/或意识形态的解释，这些解释孳生了幻想而非事实。目前撰写关于斯大林主义著作的许多作者，常常以鼓吹某一特定历史人物或政策以及归咎责任为宗旨。因此，读者和评论家往往更担心作者的意图，而不是其作品的来源或方法。

1991年2月

## 后记

没有斯大林，斯大林主义继续存在了许多年。仅这一事实似乎就推翻了我对个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强调，并支持本文讨论的对几十年苏联史的决定论解释。不过，我的观点仍然是该体制的长期存在并不一定证明其历史必然性。可以肯定，苏联体制正是新统治阶级所创造的，其运作方式也恰是他们希望的。成为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这个阶级苦心珍视、试图发展并顽固地捍卫它。毫无疑问，这个体制是建立在新阶级既得利益之上的。但我仍然认为，这个统治阶级的形成本可以被阻止，其嫩叶本可以变异为另一种植物。

观察赫鲁晓夫时代可以看到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悖论：独裁者死后，统治精英强烈排斥斯大林主义，但党的统治体系（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基石）却得到加强。为什么？强化党的权力，是因为当普通公民不再直接面临大规模镇压、处决和酷刑的恐惧，就需要为这个体制的长存提供新保障。因此，赫鲁晓夫的主要失误在于他不能（或不愿）理解1956年发动自上而下迅速革命的必要性。赫鲁晓夫未采取行动摧毁斯大林主义体制，反倒保留了其几乎全部关键要素，甚至在“皇帝”的情况下增加新手段以维持体制强大。

然而，无论领袖或党和国家机构都无法阻止来自上层的革命——下一位改革者成为了反对他所领导的制度的革命者。这段历史事实绝不容否认，尽管有理论声称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表面改革挽救迅速瓦解的体制。依我看，这种指控更多属于个人观点而非客观的科学分析或对现实的描述——我们所有人都清楚记得现实什么样。1985-1987年苏联体制仍然足够强大，因此戈尔巴乔夫的小小自由化举措会给许多政治上重要的社会群体带来希望和某种安心，戈尔巴乔夫也因此赢得了知识视野开阔、年轻进取有为的政治家美誉。这副形象，加上人们对勃列日涅夫多年来老人政治的记忆，原本能够保障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在未来一段时期发挥稳定的领导作用。我对历史决定论的唯一让步是，我假定在第三个千年的某个时候现行体制无论如何都会消亡。

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强大，及其机制在经过数年改革后仍保持完好（或至少继续运作）的能力令人惊讶。如果没有1991年8月政变的干预，体制还能持续多久？我怀疑不会太久，但我们不能忘记斯大林主义在其创造者去世后又存续了近四十年。

最终，体制的命运是由其典型行为（事实上也是任何极权制度的典型行为）决定的。我指的是基于假定和信念做出的荒唐行为——即由该体制自我宣传、一厢情愿及无法正确评估现实所产生的荒唐行为。对苏联体制力量的过高估计总是导致精英阶层的举动显得愚蠢至极（然而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这些举动似乎是因身居高位的秘密敌人所指使）。

八月政变再次证明了极权结构的规律。领导政变之人试图阻止联盟解体，却产生了新的强大离心力；他们希望挽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却导致党立即终结；他们梦想着民主运动的反弹，却给民主运动提供了最强大的助推；他们期待着旧日的普遍恐惧重新施加给人民，却将人民从恐惧的残余中彻底解放出来。在曾经被称作沙皇俄国、后来被称作苏联的广袤大地，二十世纪的第二次革命很可能将被历史学家命名为八月革命。这是一场极不寻常的革命，几乎是和平、不流血的。就八月革命的顺利程度而言，我们不妨引用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主要贡献：将体制变成一具活尸，同时摧毁它几十年来灌输的恐惧，这种恐惧甚至使体制的致命抽搐也显得来势汹汹、危险重重。在臭名昭著的三天政变期间，无论俄罗斯“白宫”或莫斯科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恐惧烟消云散。在抵御斯大林主义最后挣扎、捍卫民主的人们身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决心。所有参与那三天事件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决心，我也有幸躬逢其盛。

这种情况下乐观是很自然的，但我对俄罗斯的“民主胜利前进”（借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俄罗斯作家最近说过：“布尔什维主义是俄罗斯灵魂的一种状态。”他又说：直到我们完全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我们的过去，甚至或许包括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社会患病太多太多年了。即使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社会也不曾摆脱极端主义、不宽容和专制倾向的病毒。这些特性共同促使布尔什维主义展现其丑陋一面，获得胜利并存续几十年。真正的问题是，当今社会如何摆脱这些同样的病毒？它们是否已被民主的发展、政治文化的增长和过去的痛苦经历彻底治愈？这种疾病是否诱发了某种免疫力，就像人体内的免疫反应一样？如果答案为“是”，我们就可以乐观地展望未来。然而国家的未来发展——以及本地区新生国家的发展——仍然不可预测。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将任何分析局限于俄罗斯本土。

尽管八月革命极大推动了前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区的分裂主义趋势，但它对俄罗斯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民主愿望的涌现和恐惧的消失表明，俄罗斯社会已经为重大变革做好准备。然而，政治领导力方面的形

势依然严峻，俄罗斯的政治领导层尚未达到将俄罗斯社会从苏维埃试验中恢复所需的责任和智慧水平。历史本身在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进行了这场独特试验。如今东西方潮流已经交汇，这六分之一的土地有机会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伟大而积极的贡献。社会主义思想虽然被扭曲且常常表现为真正社会主义的讽刺画，但确实给俄罗斯留下一些重要的东西。我希望这些思想将引领俄罗斯走上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早已探索过的路径，并将不可避免地塑造目前正脱离斯大林主义深渊的社会的性质。

1991年10月